
Deagrarianization and Depeasantization: A Dynamic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Zhanping H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China

huzhanping2006@163.com

去农化与去小农化：中国乡村变迁的动态过程

呼占平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terms of “deagrarianization” 去农化 and “depeasantization” 去小农化, this article aims to reinterpret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rural China from a theoret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Deagrarianization and depeasantization interwove to shap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reform era, rural China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deagrarianization without depeasantization” to “salient depeasantization.” In the end, deagrarianization led to a continual process of deterior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urned rural China into a space of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where multiple forms of agriculture coexisted. The mode of “part-time factory worker and part-time farmer” that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deagrarianization gradually yielded to the specializing mode of “full-time farmer” or “full-time work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dynamically on the basis of a recognition of these two interwoven processes.

Keywords: deagrarianization; depeasantization; rural transform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摘要：在理论阐释与全球变迁的视野下，本文以去农化和去小农化两个概念来理解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变迁。本文认为，去农化和去小农化既相互交织，又有所相异，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变迁的动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从“无去小农化的去农化”到“显著去小农化”的过程转变。就结果而言，去农化在总体上让中国乡村不断衰落的同时也使中国乡村成为了一个复杂空间。去小农化正在将中国农业转变成为一个多元版图，多种

农业形式共存。去农化过程中形成的“半工半耕”多元生计模式在去小农化过程中正转变成全耕或全工的专业化生计模式。乡村振兴战略应在认识这两个动态过程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

关键字：去农化，去小农化，乡村变迁，乡村振兴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这一历史性变迁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观。这一变迁过程是复杂多维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富有启示的尝试。例如，在农业领域，黄宗智（2006）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过密化的小农农业经历了一个去过密化过程；张谦和杜强发现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体已被分化成不同的形式，农业资本主义正在崛起（Zhang and Donaldson, 2010）。在农民理性的转变上，徐勇和邓大才（2006）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被卷入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中国农村和农民正处于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在解释农民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上，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提出了“半工半耕”农户生计模式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渐进城镇化”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可行路径。在城乡关系层面，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提出中国正由城乡二元分割的模式进入城乡互动平衡的“城乡中国”模式。在农村变迁的深层原因层面，叶敬忠（2012）和张谦（2016）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农民被深深嵌入市场关系中。

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去农化与去小农化¹两大进程来理解中国乡村复杂的变迁过程。既有研究或对其中一个过程进行了概念化，或者将两个过程中的现象同时纳入到一个概念中。去农化和去小农化是两个互相交织又有所区别的社会经济过程，本文认为将两个过程分开讨论可以对中国乡村变迁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理论意涵，并简述两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势；第三部分

¹ 学术界经常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来分别指代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过程。这种视角是以“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变化过程，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变迁在这种概念化中会被简化成特定“预期结果”的影响因素。并且，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必然引致去农化。而去农化和去小农化是从农民、农村和农业的视角来概念化变迁，不预设一个既定的结果，更能展示变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回归变迁主体的位置来思考变迁，这是本研究采用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主要原因。

考察中国乡村的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进程；第四部分在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视角下思考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

二、去农化与去小农化：理论意涵与全球趋势

（一）去农化

去农化的过程被国内外学者们进行了多样的阐释，使用的概念也各有相异（Araghi, 1995; van der Ploeg, 2013; 胡景北, 2018）。最为明确地概念化“去农化”

（deagrarianization）的是布莱赛森（Bryceson, 1996, 1997, 2000），而后被瑞格（Rigg, 2006）进行了拓展。布莱赛森对去农化从四个维度进行概念化：1. 农民职业活动的重新适应；2. 农户收入的重新转向；3. 农民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位；4. 农民居住空间的重新安置（Bryceson, 1996）。瑞格增加了第五个维度：5. 农村空间的重新阐释（Rigg, 2006）。去农化表征为以下五个互相交织的具体过程：1. 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活动多元化；2. 农村家庭和国家层面中的农业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3. 国家经济中农业人均产值比例逐渐下降；4. 农村居住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5. 农村的文化认同趋向于城市文化。由此可见，去农化是多维度的：不仅是国家层面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农户家庭层面中短期的生计策略；不仅包含经济层面农民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还包含农民在身份、文化、以及空间上面的转化。去农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全球社会中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变：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到城市（城镇）、从农民向市民以及从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的转变。

去农化的理论背景来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工业和农业关系的论述（Bryceson, 1996）。基于英国的经验，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维持必须要求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无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去农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20世纪中期，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部门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不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当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二元经济结构便不再存在。在此，去农化是一个推动整个经济走向发展和平衡的过程。后来的农业变迁理论，农村-城市迁移理论、非正规经济部门研究都为去农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在实践中，去农化是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同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经历去农化的过程（胡景北, 2018; Bryceson, 2019）。就动力而言，去农化既可能是自

上而下的国家推动诱导，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或者是二者的合力。应注意的是，尽管理论上去农化是国家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路径，但在实践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必然伴随去农化（刘守英等，2018）。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便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二元对立的状态，工业化的发展并没有引致去农化过程（李克强，1991）。因此，去农化并非一个自发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被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形塑的过程，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会导致不同的去农化轨迹。

（二）去小农化

去小农化（depeasantization）概念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指向了不同的定义。农业社会学家杨·普罗格（van der Ploeg, 2018）将去小农化定义为一个双维过程：农民数量的逐渐减少与小农农业组织方式的逐渐弱化，在此他将去农化也包含进了此概念中（类似的情况见Araghi, 1995）。如此定义有其合理性，因为很大程度上，全球范围内离开农业的农民主要由小农组成，去农化也就意味着去小农化。但很多时候减少的农民可能转化为农业工人，其就业部门仍然为农业领域，就业地点仍旧为乡村，此种形式的去小农化并不属于去农化了。因此，将去农化与去小农化混合起来也会让概念的外延模糊，不利于精确地概括变迁的特定过程。更确切地讲，去小农化是指小农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弱化或消失（Bryceson, 2000; McMichael, 2012）。

理解去小农化，有必要先厘清小农（peasantry）这一关键概念。不同学者对小农的理解和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布莱赛森在农民学者沙宁的基础上对小农进行了全面的概念化，在她看来，小农由四个要素组成：1. 土地/农业：以农业为本的生计活动，既自给自足又参与商品生产；2. 家庭：家庭构成了生产、消费、再生产、社会化、风险控制的基本单位；3. 阶级地位：屈服于国家权威和市场力量；4. 社区：居住于村庄并践行传统的道义经济（Bryceson, 2000）。其中前三个要素是必要条件，第四个是补充要素。因此，去小农化的过程一般表现为以下四个相互交织的具体过程：1. 小规模家庭农业的消失；2. 农业生产自给程度的降低；3. 无地农民数量和雇佣劳动力的增加；4. 大规模现代农业和农业企业家的大量出现。从动力的角度看，小农农业消失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的农业现代化（Roberts, 1990; McMichael, 2012; van der Ploeg, 2018）。在农业现代化的叙事中，小农农业经常被构建成“传统的”、“落后的”部门，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发展前景暗淡。因此，在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小农的数量应该减少，多余的劳动力应该转移到城市或工业领域，剩下的土地应该进行规模化和现代技术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规模

经济 (van der Ploeg, 2018)。世界范围内, 农业现代化经常由国家主导推动, 并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推进, 合力改造农民和农业以及整个乡村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 小农农业本身并不是一个同质单一的农业类型, 而是基于特定宏观和微观条件而形成的多种农业类型的集合体 (Bryceson, 2000; van der Ploeg, 2018)。例如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小农农业中可能包含 (但不限于): 中小规模家庭农业, 不同兼业程度的小规模家庭农业, 留守家庭农业, 半商业半自给农业, 纯自给小规模农业等。这些小农农业类型的去小农化轨迹也不尽相同。

另外, 去小农化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 其中充满了循环与反复, 妥协与抗争。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 放弃小农生产和生活的人, 可能重新做回小农; 大规模现代化农业可能会转变成小农农业; 农业之外的人可能选择做小农农业。“再小农化”(repeasantization) 已在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广泛发生 (van der Ploeg, 2008; 许惠娇等, 2017)。因此, “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是相互交织的社会经济过程。

(三) 去农化与去小农化的关系

去农化与去小农化经常交织进行, 但仍然是两个理论和实践上相异的过程。首先, 去农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去小农化 (Bryceson, 2000; Ellis, 2006)。去农化过程中的生计多元化或兼业化经常成为小农家庭的生存策略, 大部分兼业农户仍然从事着小农农业。因此, 农业人口逐渐流向非农部门, 经历去农化, 但并不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定或者立即被“现代化”成大规模资本农业。其次, 去小农化并不一定去农化。小农户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转变成现代农业企业家, 经营规模农业, 仍旧生活在乡村, 从事农业, 身份为农民, 并没有经历去农化。因此, 去农化是人口在就业部门和居住空间上的非农转换; 去小农化更多的是农业领域内部组织方式变化。

区别之外, 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密。首先, 去农化可以为去小农化创造社会经济空间。随着农民家庭生计多元化的不断发展, 非农收入在小农家庭收入结构中逐渐占主导, 加之农业劳动力短缺, 以致农业活动被逐渐挤出, 最终脱离土地, 成为“非农户”或“城镇人口”, 进而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资本化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 去农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专业化可成为“去小农化”的动力之一 (McMichael, 2012)。其次, 去小农化可能是去农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Bryceson, 2000)。小农家庭放弃小农农业之后, 可能不再从事任何农业活动, 而是迁入城市生活, 成为工人或商人, 这个过程是去农化的典型形式之一。

在两大过程之中，小农家庭扮演着“媒介”角色，是变迁的关键场域。很多时候，不彻底的去农化是因为小农家庭的协作分工引致的多元就业模式，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男性外出务工，女性从事农业；青年人外出务工，老人从事农业等小农生产模式。因此在微观层面，家庭内部的性别与代际关系组织和协调着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进程。在宏观层面，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土地制度以及农业农村发展政策都会对去农化和去小农化有显著的规制或赋能作用（Zhang and Donaldson, 2010；叶敬忠和张明皓，2020）。例如，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鼓励政策等都会对去农化和去小农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焦长权和董磊明，2018）。

（四）全球视野下的去农化与去小农化过程

可以说，20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经历的最为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就是去农化（Araghi, 1995; Bryceson, 2000; 胡景北，2018）。2007年联合国宣布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7）。尽管去农化主导了历史趋势，但整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仍呈现出动态多元的复杂特征，去小农化也在其中相互交织进行。粗略来讲，战后全球农业和农村变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如表1所示）：1945-1970年期间，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使得其发展模型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进行转移，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都在逐渐降低。为满足国家粮食需求，绿色革命开始推行，农业现代化推进，小农式农业生产模式不断遭到侵蚀。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经济秩序进入重组阶段，全球农业市场形成，农业和农民进一步参与并依赖市场力量，农业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农业和契约农业迅速发展，农业进一步现代化和产业化。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了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反思和抵抗。另外，国家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普遍危机，农村凋敝，小规模农民陷入贫困，环境退化等问题严重。以至于在整体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反向的过程：再小农化（van der Ploeg, 2008）。为摆脱资本和市场的控制，争取更大的自主性，小农式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成为农业群体的选择。当然，“再小农化”尽管已经出现，但是仍然无法成为主流力量，真正的趋势仍旧是去农化和去小农化。整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农业和农村正朝向多功能农业和消费空间转向（Wilson, 2007）；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不同形态的去农化和去小农化过程（Bryceson, 2000; Rigg, 2006;

Vanhaute,2012)。

全球农业和农村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不断扩张和深化 (Araghi, 1995; Vanhaute, 2012)。在此过程中, 商品化和市场化改变了农村和农业的形态, 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 破坏了小农农业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并且, 国家在其中经常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van der Ploeg, 2018)。

此为工作草稿

表 1：全球视野下去农化与去小农化进程

阶段	政治经济背景	变迁特征
1945-1970 年代： 美国霸权下的世界市场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立与制度化	以美国为模型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 小农阶层为争取土地权而斗争；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与绿色革命； 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建立与成熟。	国家支持下的农业生产率增长； 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农民家庭获得土地所有权； 家庭农业的资本积累的出现与发展； 商品化的发展与小农生计的多元化； 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稳定下降； 全球范围农村外迁人口的比重稳定上升。
1970-1990 年末： 旧政治经济秩序崩溃后世界政治经济制度的重组阶段	全球化与去国家化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扩张，金融资本脱离管制； 从国家发展主义向市场导向的专业化； 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 世界农业的国际化与产业化进一步深化。	农业补贴的削减； 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参与非农经济活动； 城市部门一进步吸纳农村人口； 农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雇佣劳动力增加； 经济作物和合同农业进一步发展； 农村贫富差距扩大； 小农农业被建构成“传统的”，“落后的”部门。
2000-以来： 全球经济危机后的重新调整； 新自由主义面临挑战	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同时遭到地方抵抗； 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引致农业和农民生计危机； 全球食品帝国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抵抗。	农村外迁人口进一步扩大，城市化率稳定上升； 农业工业化、资本化趋势进一步加深； 非农活动逐渐成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整体去农化和去小农化进程中的“再小农化”现象出现； 新式小农群体和农业组织方式的涌现。

来源：整合自 Araghi 1995; Wilson, 2007; van der Ploeg, 2008, 2018.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去农化与去小农化进程

(一) 去农化进程

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去农化。中国乡村去农化的起点是土地制度改革所创造的相对平等均质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和小农农民。19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极度渴望转化为强烈的耕作动力，此时的农民干劲十足，经营活动聚焦在土地和农业上，充分利用土地和家庭劳动力获取更多的农产品 (Lin, 1992)。可以说，此阶段的中国农民是较为纯粹的小农状态，同时存在严重的农业人口过密化问题 (黄宗智, 2006; Zhang and Donaldson, 2010)。真正的去农化始于乡镇企业发展阶段。1980 年代初，

国家发起了发展乡镇企业战略，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就地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又被称为“离土不离乡”²的生计多元化。1989年，县域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将近3000万农民就业，省际间农民流动较少，只占到当时农民工人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从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农业劳动力占全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从71.4%下降到了57.8%，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9.2%提高到了23.8%（李克强，1991）。总体而言，1980年代，尽管去农化已经开始，但对中国农民家庭来说，土地或农业仍然为农民家庭收入和经济生活的中心，纯农户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I型兼业户占大多数。乡村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主要空间，并且在社会文化层面，乡村还没有被现代性话语所污名。

1990年代至2008年左右，去农化进入一个新阶段。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逐渐衰落，沿海地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开始大规模吸纳农村青壮劳动力，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工厂”时代，“离土不离乡”的去农化向“离土又离乡”的形式转换。外出农民数量从1990年代初期的2000万增加到2007年的1.3亿，并连续稳定增长（如图1所示）。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使外出务工农民必须进行“候鸟式”的城乡间、农和非农间流动摆荡，中国的小农家庭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重新组织。以土地为中心的生计模式逐渐转换成了“半工半耕”（男工女耕和子工老耕）的家庭生计模式（黄宗智，2006；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外出务工的收入逐渐成为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土地逐渐被边缘化。根据全国范围的调查，农民生计结构的去农化趋势稳定而显著，以非农收入为主的II型兼业户和非农户的比例逐渐增加，纯农户的比例到2009年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如图2所示）。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质性变化，“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贺雪峰，2002）；乡村文化逐渐由城市现代文化主导，农业被认为是一个“落后的”、“没出息的”职业；“离开农业”、“跳出农门”成为乡村文化的“政治正确”。如严海蓉（2009：26）所言，“农村不但丧失了其相对自主的存在而变成了现代性的反面，而且成为城市的反面教材”。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制造业，全国范围内出现一定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呈现“再农化”趋势，但是返乡农民工经过短暂调整，绝大部分重新加入外出务工行列，外出务工规模仍旧呈稳定上升趋势，去农化仍旧是延续至今的主导趋势。到2012年，全国

² “离土不离乡”的概括或许并不完全准确。绝大部分参与本地企业就业的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土地和农业（李克强，1991；刘守英等，2018）。

范围的调查显示（图 2），II 型兼业农户和非农户的总比例超过 50%，意味着中国农民的整体生计结构正式进入以非农经济为主导的阶段，农业来源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进一步缩减。另外，非农户比例的稳定增加，意味着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逐渐转变或消解，多元生计模式正走向部分农民“全耕”（中层农民），部分农民“全工（商）”的专业化状态。当然，在此过程中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以及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以多元生计模式为特征的老人农业和留守妇女农业创造了持续存在的条件（焦长权和董磊明，2018）。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农业形式同样面临其它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并不稳定，例如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或者政府推动的土地规模化都极可能使农村中的老人或妇女脱离土地。

从现有趋势看，在去农化过程中农民的生计结构经历着历时性的演变：从纯小农的农业部门内多元模式逐渐向半工半耕的跨部门多元模式转化，并出现显著的专业化生计模式趋势。因此我们在讨论半工半耕模式在中国农民中的主导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历时性的变化。不过，也应该认识到，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演变和宏观比例的演变并不一定是同步同向的，这种看似“目的论”式的宏观转变必然充满着微观层面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演变的发生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和经验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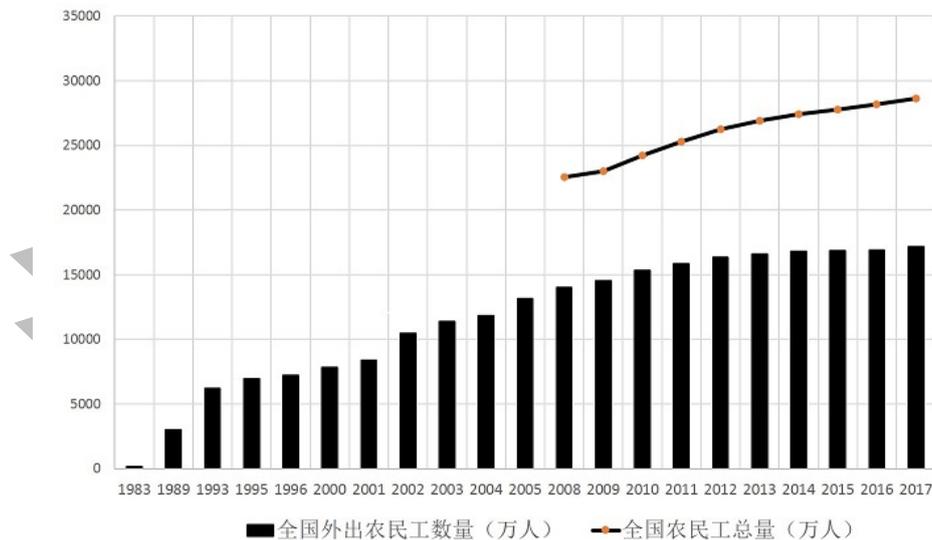


图 1：全国农民工数量与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趋势（1983-20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以及各年度中国农民工监测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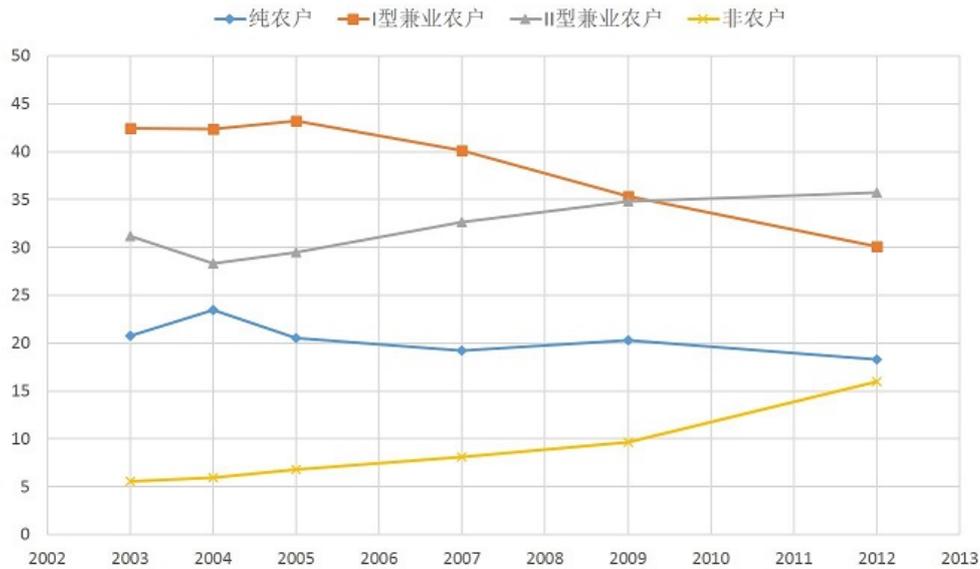


图 2：农户的分化趋势（国家统计局对 7 万户农民的调查）

数据来源：Liu 等, 2018

在国家宏观层面，去农化进程同样显著（如图 3 所示）。快速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下降，从 1978 年的 30% 降至 2016 年 8.6%。乡村人口比重从 1978 年的 80.1% 降至 2016 年的 42.7%。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 降至 2016 年的 27.6%。村庄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每天数以百计的村庄正在消失（彭小辉等，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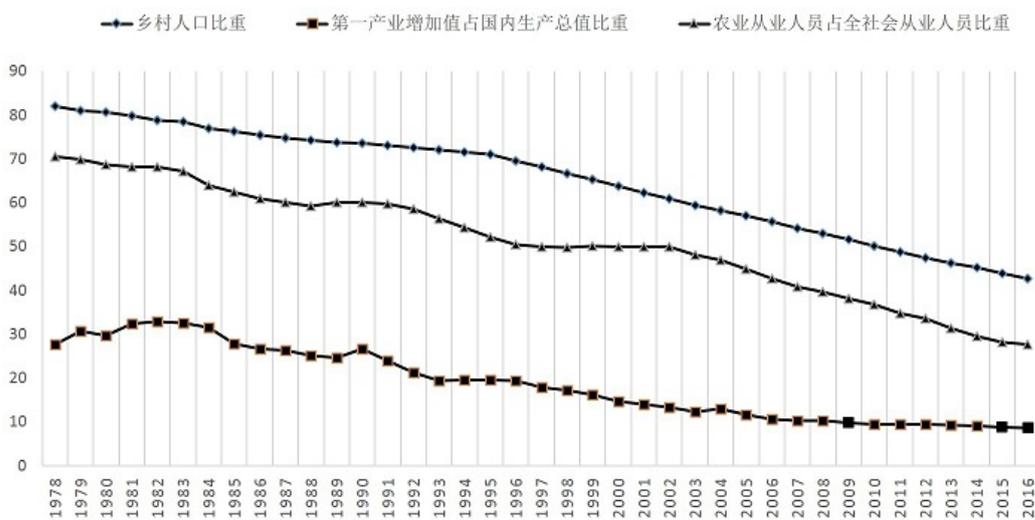


图 3：中国去农化进程（1978-201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尽管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非农就业的规模和形式,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去农化进程是连续而稳定的。但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变化的同一性,在 40 年的时间里,去农化的逻辑和影响已经出现了质性的流变。正如表 2 所粗略勾勒的,随着去农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农流动正在从乡-城的单向转移向乡-城双向流动转变,农民家庭多元生计正从农业为中心转向非农为中心的生计结构,乡村作为单纯的农业生产的空间正转向农业生产和去农化经历带来的消费主义并存的混杂空间。这种生产、生活、身份、文化等多维度的转变正在重新定义中国乡村的内核。

表 2: 中国去农化过程的逻辑变化: 一个粗略勾勒

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中后期
农业内卷化带来的“主动去农化”	深度嵌入市场关系带来的“被迫的去农化”
以农业为中心的多元生计	以非农经济为中心的多元生计
以乡村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多地-流动性的家庭生活
以乡村熟人社会为特征的社会交往	以“半熟人”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想象
作为农民身份的第一代农民工	“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的二代三代农民工
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的空间	乡村作为农业生产和现代消费主义的混杂空间

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去小农化进程

四十年前开始的去农化进程并没有立即带来去小农化。从“离土不离乡”的本地非农就业到“离土又离乡”的人地分离阶段,中国农业整体上仍旧以小农农业为主,以致小农农业的坚韧存在也成为很多学者理解中国乡村变迁的出发点(黄宗智, 2006; Zhang and Donaldson, 2010; 贺雪峰, 2013; 叶敬忠, 2013)。不过,持续的去农化进程给小农家庭和小农农业带来了压力以及变迁的动力。随着农民就业活动的多元化,中国的农业组织形式逐渐从较为纯粹的小农农业转变成“半工半耕”、“留守农业”(农业女性化和农业老龄化)、中小规模家庭商品农业等多元形式。但是,这种变化在质性上属于小农农业集体内部的变化,小农生产的方式仍旧基本维持着,其特征表现为: 家庭人员仍是农业劳动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土地在家庭生计中仍旧扮演着重要作用(尽管土地收入的比重逐渐减小,

仍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农产品一部分用来自给自足，一部分用来市场交换。

不过，持续的去农化逐渐削弱了小农农业的生存空间，小规模家庭农业开始失去其韧性。例如，在老人农业中，老人年龄过高，加之需花费大量精力照顾孙辈，使其难以从事农业生产；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城陪子女读书使女性农业愈发失去存在空间；另外，对不少农民家庭来说，非农收入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再生产以致农业耕作变得无足轻重。在精壮劳动力严重缺失的状况下，土地开始被一部分农民家庭放弃，或者流转给亲友，或者减少耕作密度，甚至抛荒。小农农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效益低下，以致费力不讨好的农业生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心头之痛。一时间，“谁来耕地”成为政策和学术领域的关注热点。二十多年的去农化进程将中国农业推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Zhang and Donaldson, 2010)。

大致从 2000 年代初期开始，农业内部的裂变悄然展开。去农化进程引致的农业劳动力流失推动着乡村内部的非正式的土地流转，继而国家正式推动了土地流转市场，规模化的农业组织形式开始大量涌现。土地流转初期多以村庄内部农民之间的非正式流转为主要形式。在外出务工及其它非农经济活动的推动下，不愿意或没有条件耕种土地的农民开始将土地流转给亲朋乡邻，一方面维持自身的土地承包权，一方面顺应了家庭生计活动的发展趋势。应该指出的是，村庄内非正式的土地流转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皆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在 2000 年代初期在去农化的持续推动下愈发显化。村庄共同体内部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建立在村庄已有的社会纽带之上，具有一定的互惠互助的道德经济意味 (冯小, 2015; 朱冬亮, 2020)。换言之，村庄内部非正式的土地流转是在去农化冲击下小农家庭以及村庄共同体的应对策略。

真正的冲击来自于国家支持之下的正式的土地流转市场。200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后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政策推动土地流转 (朱冬亮, 2020)。特别是，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该文件从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土地流转作为国家推动农业转型的主要形式，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打开了政策窗口 (Ye, 2015)。另外，一系列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土地市场的形成和扩展，使得农业公司成为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群体分化的重要力量 (Zhang and Donaldson, 2010; 严海蓉和陈义媛, 2015)。土地流转的进展是显著的。如图 4 所示，中国土地流转面积从 2007 年的 0.64 亿亩增长到 2016 年的 4.7 亿亩，三分之一以上的全国耕地进入流转市场。根据 2019 年国务院扶贫办

的最新数据，目前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5.12 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37%，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到 7070 万户，占家庭承包农户的 31.2%，并呈持续增长趋势（国务院扶贫办，2019）。鉴于现有统计主要针对向政府部门备案的流转情况，实际发生的流转面积和比例可能会更高（朱冬亮，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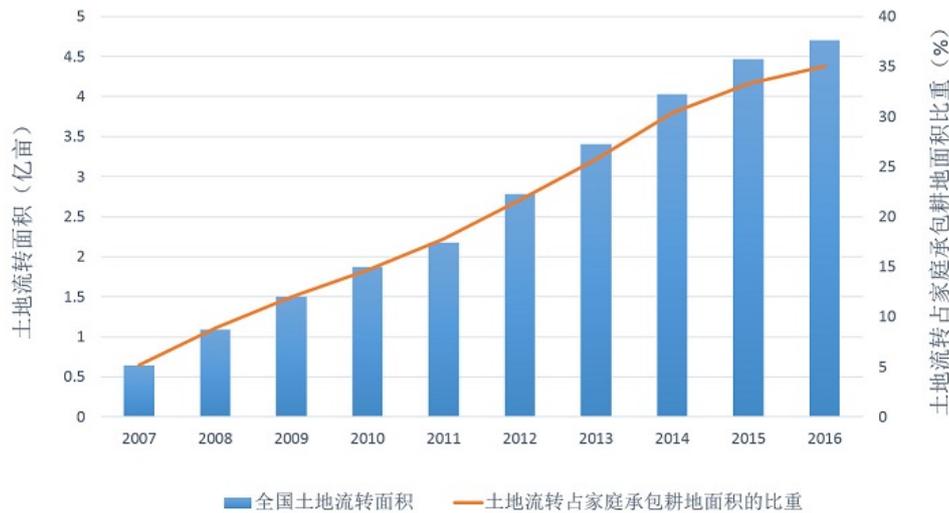


图 4：中国农业土地流转面积发展趋势（2007-2016）

数据来源：整合自农业农村部官方发布数据

土地流转直接推动了农业组织形式的质性变化，农民的土地在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推动下逐渐流转给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国家推动农业转型的主要抓手，也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资本主导的农业公司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参与者。此类农业组织以土地规模化、高资本投入、雇佣劳动以及利润追求为特点，具有鲜明的农业资本主义性质（严海蓉和陈义媛，2015）。据统计，2016 年，有 4638 万亩土地流转给了农业公司，占流转总面积的 10% 左右。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部分是由公司或乡村精英组织成立，实质上属于公司农业的组织形式。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成为这个时期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2017 年农业农村部调查了 30 个省（不含西藏）的 48.5 万个家庭农场，经营着近 9000 万亩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 175 亩，并且超过 80% 的家庭农场土地来自于流转经营。冯小（2015）在皖南一个乡镇的详细调查展示了该镇农业形式的质性变迁：从原有的 8700 户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体系转向了由 5 个公司农场和约 100 个家庭农场为主的规模化的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已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小农家庭农业。尽管仍以家庭人员为主要劳动力，

但家庭农场的运作过程是以资本积累为目标、以雇佣劳动为劳动力补充、以商品化生产为方式的资本主义式生产，基本不再具有小农农业的特征（陈义媛，2013；冯小，2015；焦长权，2018）。

在此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少农民一边拿着自家的土地租金，一边在村庄内成为农业工人，基本生活资料几乎全部商品化（张谦，2016）；也有一部分年轻家庭离开村庄定居城市或城镇（Ye and LeGates, 2013）。小农式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放弃，去小农化日趋显化。当然，在中国现有土地制度下，土地流转并不意味着农民完全失去土地，但却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至少是暂时）与土地以及土地为基础的生计模式的分离。对部分农民家庭来说，曾经半工半耕的多元生计模式难以为继，演变成更加专业化的非农生计或者纯农生计。

土地流转和规模化农场只是去小农化的一个层面。近些年小规模家庭半自给半商品式的家畜养殖同样正在消失，资本化的家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农业企业成为养殖业的经营主体，“粮食—牲畜一体化”的小农模式转向了规模化的资本化工业化生产模式，相当一部分农民的肉蛋消费开始完全依赖市场（曾红萍，2017）。中国畜牧统计年鉴数据（1995-2015）显示，年出栏50头以内的小规模生猪养殖农户从2002年的一亿户降到2014年的4600万户，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从1998年的不到两万家增加到2014年的将近27万家，并成为中国生猪产量的主要贡献者。根据笔者最近在河北和山东农村的田野调查，很多村庄仍在进行小规模养殖家禽家畜的农户不足10%，有的村庄甚至一户都没有。养殖领域的去小农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家庭养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农民在村庄的长期稳定的生活，但日益普遍的流动性和多地点生计模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在村庄生活，而他们相对缺乏体力和技术进行养殖。二是国家对规模化养殖场的政策支持也是关键原因（曾红萍，2017）。另外，最近几年的农村环境治理运动一方面规范了规模养殖场，另一方面也缩小了小农家庭养殖的生存空间。

从理论层面看，中国的去小农化沿着两条主要路径展开（Zhang and Donaldson, 2010；焦长权，2018）：一是部分小农群体通过资本积累转化为高度资本化和商品化的小农场主（farmers），其生产与生活皆围绕市场来组织，高度依附市场；二是资本主义农业公司取代小农农业，农民变成农场工人。现阶段在土地流转中涌现出的中等规模家庭农场以及村庄中进行专业化农业生产的“中农阶层”可以理解为去小农化的第一条路径；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农业公司代表了去小农化的第二条路径。

学者们对中国的去小农化主要以第一种方式为主还是以第二种方式为主仍在争论中。

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正在从小农式的过密化农业向“劳动-资本”双密集型的家庭农业转型，在此过程中，农业以高度资本化和商品化为主要特点，并未出现显著的资本主义化（农民变为农业工人）（黄宗智，2016；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严海蓉和陈义媛（2015）通过分析认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特征已经十分明显。即便在家庭农场中，雇佣劳动占总劳动约三成（28%）。现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特征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其他形式的农业正在通过各种形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

本文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转型，都难以掩盖背后的共识：小农农业正在此过程中被转化成非小农的形式，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明显式微。黄宗智提出的“新农业”，尽管其仍旧称之为小农农业，但本质上代表了高度资本化和商品化的家庭农业。这种农业形式尽管仍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但生产逻辑已经高度商品化和资本化，从事新农业的农民也成为不同于传统小农的“新农民”（焦长权，2018）。

或许张谦和杜强的讨论更恰当：当前阶段，与其说理论上去小农化一定会采用何种路径，更现实的是在特定结构性条件下，乡村行动者们在努力尝试不同的农业组织形式，并在尝试过程中不断调整组织形式（Zhang and Donaldson, 2010）。因此，我们会看到去小农化过程中多种农业组织形式的并存和共演形态。从横向并存来看，张谦和杜强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了六种不同于传统小农生产的农业组织形式（Zhang and Donaldson, 2010）。张谦

（2014）通过调研发现三种农业转型的地方模式：企业带动的公司化经营、农户的家庭独立经营和合作化经营。从纵向演变来看，新型经营主体之间也存在替代现象。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开始后的资本下乡热潮催生出了大量完全依赖农业雇工的企业农场，此类农场大多以外来资本为基础，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但是在遭遇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雇工式公司农场经常遭遇各种管理危机，例如监督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过高以及市场压力大等，导致其效率低下，难以为继，以至于此类模式经常被家庭农场所替代（冯小，2015）。虽然转型路径和现有形式多种多样，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此过程中，小农农业生产和生活形式正在衰落，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区价值和文化正在解体。

或许有人会争论称，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中国仍有 2.3 亿农业经营主体，98% 仍旧为户均耕地规模小于 10 亩的农民家庭，何谈“显著去小农化”？在此应该区分小农户和小农两个概念。如叶敬忠和张明皓（2019）所辨析，小农户是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土地规模小的农民家庭；小农的内涵指向农民所处的特定生产关系，是小农户的小规模生产和特定生产方式的统一体。在当代语境下，小农指向了与完全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生产方式不同的追求自主性、远离市场依附、以及与自然合作生产的特点。因此，不可否认，中国绝大

部分农业经营主体仍然为小农户，但在各个市场要素的不断发展下，其生产与生活形式已经高度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自给程度已经很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部门数据之间本身存在巨大偏差。前文中土地流转的数据显示，至今 31% 的农户流转出家庭承包耕地，即便其中有家庭不是完全流转出耕地，仍旧难以想象与 98% 的经营主体仍旧为小农户的普查数据产生如此之大的差距。相关政府部门有责任进一步厘清统计数据之间的偏差，以供决策部门作出更科学的决策。

去小农化的动力，既来自于农民群体内部又来自于其外部。已有研究已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两个主要的外部动力：国家推动和市场发展。首先，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战略积极推动，加速了去小农化进程（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龚为纲和张谦，2017；陈航英，2018）。国家长期以来推行以规模化、产业化优先的农业现代化战略，大规模、标准化的农业龙头企业被推崇（黄宗智，2018），在此过程中，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边缘化（叶敬忠，2013）。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施展行政系统的巨大社会动员力量，通过项目制、以及软硬兼施等各种策略推动土地规模化（冯小，2015；龚为纲和张谦，2016）。市场方面，几十年来农业和农村的各市场要素的迅速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农资投入的市场化得到快速发展，为农业的深度商品化、资本化提供了便利条件（Zhang and Donaldson, 2010；焦长权和董磊明，2018）。来自城市以及工商部门的外部资本直接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实现了对乡村的再造（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

同时，去小农化的内部动力也不容忽视。去农化过程中农民生计导向非农经济活动过程的内部需求成为去小农化的内部动力。如表 3 所展示，不少经验研究都发现农民的土地转出或被征走的意愿在近些年不断增强，有的地区甚至一半以上的农民希望将土地流转出去。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山东和河北一带的农村，只要保证租金按时兑现，八成以上的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不少研究发现非农经济在农户家庭生计结构中的占比越高，土地转出的意愿越强（张文秀等，2005；张忠明等，2014）。因此，在去农化整体进程中，小农群体自身的生计模式调整以及随之带来的离地意愿成为去小农化的内部动力。

应该看到，去农化和去小农化在某些情况下展现了互相加强的动态关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去小农化很多时候表现为农民离开农业甚至农村。完全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手里除了拿到土地的租金以外，似乎与农业不再有任何联系。很多人的生计活动要么完全转向城市，要么转向农村的非农部门，一小部分可能在农业部门寻找不稳定的雇工工作。另一种现象是，土地流转后，村庄的产业被再造成非农产业，甚至沦为非农化的村庄（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在此情境下，去小农化进一步推动了去农化进程。

表 3：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调查：一个不完全的文献汇总

年份	样本数量	调研地区	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民比例 (%)	研究者
2002	1000	浙北	22.5	钱文荣 (2002)
2009	175	湖南	21.7	曾超群 (2015)
2010	1032	十省份	38.1	乐章 (2010)
2014	310	湖南	51	曾超群 (2015)
2016	621	山东	44.9	王成利 (2016)

整体来看，中国乡村的去小农化愈发显著。但同时应避免“小农必然消失”的目的论观点。全球各国的农业转型经历已经充分说明，小农转化的路径和形式是多元的，小农终结并不是普遍的历史经验 (Vanhaute et al., 2016)。转型过程中特定时空下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影响着具体的变迁路径 (Zhang and Donaldson, 2010; Vanhaute et al., 2016)。进一步来讲，特定结构性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过程。例如，中国农业机械化革命既为留守农业等小农农业形式的长期存续创造了条件，进而延滞了去小农化进程，又为土地的规模化和资本化提供了动力，进而推动了农民的分化，助推了去小农化进程 (焦长权和董磊明, 2018)。中国社会的食品消费结构变化不仅为大规模养殖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社会群体对质量和口味的追求也为小农方式的种养殖提供了存续空间 (许惠娇等, 2017)。因此，可以看出去小农化的趋势下，特定的结构性因素也为再小农化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综上所述，从去农化和去小农化两个过程理解中国乡村变迁，似乎可以发现一个隐藏的变化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去农化和去小农化开始逐渐汇流，这个汇流的过程，是中国农民从过密的小农模式到半工半耕家庭生产模式，再到该模式逐渐转变或瓦解的过程；在相对稳定的去农化过程中，伴随着从不显著的去小农化到显著的去小农化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整个过程中结构性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多元形态。再农化 (返回农村和农业) 和再小农化尽管难为主导趋势，但是仍然面临着结构性机会。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再农化的系统努力，因此，充分了解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交织的变迁过程，对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的意义。下一节从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角度简略讨论乡村振兴应注意的问题。

四、去农化和去小农化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

去农化和去小农化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变迁的基本维度：一个在整体乡村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层面，一个在农业领域内部。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乡村作为农民“三位一体”（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开始分裂（卢晖临，2019），离开农村和农业成为大部分农民进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中国的去农化和去小农化过程告诉我们，思考中国乡村变迁，应注重理解“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避免“目的论”的思维方式，用现代化或者城市化的“终点”去评判现有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乡村变迁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而在理解“过程”时，关注点应放在变化的主体--农民上：在去农化和去小农化过程中，他们生产和生活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在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最新形势下，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期待通过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共同努力来重新激活乡村空间。某种程度上讲，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为了应对去农化过程引致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得乡村成为了被遗弃的空间的问题（卢晖临，2019）。在去农化和去小农化的视角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注意以下四点：

（一）在去农化进程中，乡村空间处在不断流变的状态，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注重对“过程”的治理。这意味着乡村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保持弹性与动态性，及时根据新形势进行调整，增强预判能力，提前储备相关政策。另外，去农化进程使中国乡村变成一个“复杂”或“异质”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生产的，也是消费的；既是离开的地方，又是回归的故乡；其中的生产形式既相互共生共演，又在特定条件下互相制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复杂空间的治理，处理各个力量和行动者的关系尤其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二）去农化源自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人口转移。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情境，中国难以像西欧国家一样实现彻底的去农化（至少在短时期内）。作为巨量中间群体的农民工，无论是变成城市人口或者回归乡村，又或者保持中间状态，都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应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业或城市部门面对农民的开放度，让有能力有意愿进城的农民，获得真正的身份和稳定的保障。作为一种再农化努力，近些年国家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有上千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返乡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乡村活力，为乡村发展带来动力。然而须清醒的是，返乡创业群体所参与的行业大多以服务业为主，与农业的关联度并不强。因此，在鼓励创业类型多元化的同时，也应该努力发掘返乡人员中有志

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群体，为其提供支持措施，在振兴乡村经济的同时振兴农业。

（三）去小农化过程中，强制与自愿并存，保障农民的自主性尤为重要。在土地流转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有的农民是自愿离开农业的，也有农民因外部资本和政府动员被迫离开土地。因此，通过合理的机制赋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性和重新回归农业的自由尤为重要，当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时候，土地仍旧是大部门农民应对生活和生产风险的重要工具。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是否能够增加小农在去小农化的过程的自主性仍需要经验观察，但在原则上，应积极鼓励乡村内部农民自发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中农阶层；抑制外部大资本对土地的攫取和对农民利益的侵蚀。同时，应该充分尊重再小农化的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愿意进行小农式生产和生活的群体提供支持。

（四）最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在去农化过程中形成了动态弹性的农民家庭生计模式。这种生计模式让农民能够与外部非农工作机会进行弹性互动，抵抗全球和国内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现在这种模式似乎处于一个转变的拐点：至少对相当一部分农户来说，这种多元弹性的生计模式正转变成更加依赖外部力量单一性生计模式。这种从多元到单一的转变过程中，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会相对降低，如何保障这部分农户的生存弹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陈航英 (2018): 《中国农业转型及动力机制再思考: 基于皖南河镇的的经验研究》。《开放时代》第 3 期, 第 76-94 页。
- 陈义媛 (2013):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开放时代》第 4 期, 第 137-156 页。
- 冯小 (2015): 《去小农化: 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
- 龚为纲、张谦 (2016): 《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开放时代》第 5 期, 第 57-75 页。
- 国务院扶贫办 (2019):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4354 号建议的答复》。国务院网站: http://www.cpad.gov.cn/art/2019/12/13/art_2202_108402.html
- 贺雪峰 (2002): 《半熟人社会》。《开放时代》第 1 期, 第 114-115 页。
- 贺雪峰 (2013): 《小农立场》。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胡景北 (2018): 《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学术月刊》第 1 期, 第 85-95 页。
- 黄宗智 (2006): 《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模式过密型农业》。《读书》第 2 期, 第 30-37 页。
- 黄宗智 (2016):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1980-2010)》。《开放时代》第 2 期, 第 11-35 页。
- 黄宗智 (2018): 《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第 3 期, 第 62-75 页。
-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 (2012):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开放时代》第 3 期, 第 10-30 页。
- 焦长权 (2018): 《从“过密化”到“资本化”: “新农业”与“新农民”—以湖北省恩施市烟叶种植农户为例的讨论》。《中国乡村研究》第 14 辑, 第 343-373 页。
- 焦长权、周飞舟 (2016):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第 100-116 页。
- 焦长权、董磊明 (2018): 《从“过密化”到“机械化”: 中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历程、动力和影响 (1980~2015 年)》。《管理世界》第 10 期, 第 173-190 页。
- 李克强 (1991):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第 65-82 页。
- 乐章 (2010):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解释——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 2 期, 第 64-70+111 页。

- 刘守英、王一鹤（2018）：《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第10期，第128-146页。
- 卢晖临（2019）：《从遗弃的空间走向希望的空间》。《光明日报（第七版）》，2019年1月10日。
- 彭晓辉、史清华（2014）：《中国村庄消失之谜：一个研究概述》。《新疆农垦经济》第12期，第1-5+34页。
- 钱文荣（2002）：《浙北传统粮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64-68页。
- 王成利（2016）：《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第12期，第88-94页。
- 《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中国农民工问题总体趋势：观测“十二五”》。《改革》第8期，第5-29页。
- 夏柱智、贺雪峰（2017）：《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117-137页。
- 徐勇、邓大才（2006）：《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第7期，第5-13页。
- 许惠娇、贺聪志和叶敬忠（2017）：《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重思食品安全问题》。《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第66-75页。
- 严海蓉（2006）：《城乡关系与现代性反思》来自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和蔡禾（2006）：《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第6期，第5-35页。
-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第5期，第49-69页。
- 叶敬忠（2012）：《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5-13页。
- 叶敬忠（2013）：《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兼序<新小农阶级>中译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2-21页。
- 叶敬忠、张明皓（2019）：《“小农户”与“小农”之辩—基于“小农户”的生产力振兴和“小农”的生产关系振兴》。《南京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2页。
- 叶敬忠、张明皓（2020）：《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转向、实践探索与路径构建》。《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第48-58页。

- 曾超群（2015）：《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变化的对比分析—基于长沙、平江、慈利三县两次调查的实证研究》。《求索》第1期，第53-57页。
- 曾红萍（2017）：《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变奏：生猪养殖业中的范式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7。
- 张谦（2014）：《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国乡村研究》第十辑，第3-27页。
- 张谦（2016）：《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14-19页。
- 张文秀、李东梅、邢姝媛和张颖聪（2005）：《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4-17页。
- 张忠明、钱文荣（2014）：《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第19-24+110页。
- 中国畜牧业年鉴编辑部（2016）：《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1995-2015）》。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朱冬亮（2020）：《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第123-144页。
- Araghi, F. A. (1995) “Global depeasantization, 1945-1990.”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 2: 337-368.
- Bryceson, D. F. (1996) “Deagrarianization and rural employ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ectoral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24, 1: 97-111.
- Bryceson, D. F. (2000) “Peasant theories and smallholder policies: past and present.” Pp. 1-36 in D. Bryceson, C. Kay, and J. Mooij (eds.), *Disappearing Peasantries? Rural Labour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IT Publications.
- Bryceson, D. F. (1997) “De-agrarianis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cknowledging the inevitable.” Pp. 3-20 in D. F. Bryceson and V. Jamal (eds), *Farewell to Farms: De-agrarianisation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Bryceson, D. F. (2019) “Gender and generational patterns of African deagrarianization: evolving labour and land allocation in smallholder peasant household farming, 1980-2015.” *World Development* 113: 60-72.

-
- Ellis, F. (2006) "Agrarian change and rising vulnerability in rural Sub-Saharan Africa." *New Political Economy* 11, 3: 387-397.
-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400-449.
- Lin, J. Y.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 34-51.
- Liu, S., R. Wang, and G. Shi (2018)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changes and other key features." *China & World Economy* 26, 1: 42-65.
- McMichael, P. (2012) "Depeasantization." Pp. 681-701 in G. Ritzer (ed.)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 Rigg, J. (2006) "Land, farming,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rethinking the links in the Rural South." *World Development* 43, 1: 180-202.
- Roberts, B. R. (1990) "Peasants and Proletaria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353-377.
-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Re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ata from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 The 2007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
- Van der Ploeg, J. D. (2008)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Earthscan.
- Van der Ploeg, J. D. (2018) "From de- to repeasant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revisite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DOI: 10.1016/j.jrurstud.
- Vanhaute, E. (2012) "Peasants, peasantries and (de) peasantization 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Pp. 313-321 in S. J. Babones and C. K. Chase-Dun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World-Systems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Vanhaute, E., H. Cottyn, and Y. Wang (2016). "Peasantries." In I. Wallerstein (ed.) *The World is Out of Joint: World-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Continuing Polar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Wilson, G. A. (2007)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 Wi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 Ye, Y., and R. LeGates (2013)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earning from Chengdu.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Ye, J. (2015)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3: 314-337.

Zhang, Q. F., and J. A. Donaldson (2010) "From peasants to farmers: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labor regimes, and land-rights institutions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 *Politics & Society* 38, 4: 458-489.

Zhang, Q. F., C. Oya, and J. Ye (2015) "Bringing agriculture back in: the central place of agrarian change in rural China studie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 3: 299-313.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弹性的构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CSH020）的阶段性成果。

呼占平，男，山东聊城人，人文地理学博士，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村和农业转型、农村环境治理和能源转型。研究成果发表于 *The China Journ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等期刊。